

《钱江晚报》诞生记

郑梦熊

也是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读报需求,更是发展壮大浙报事业的重大举措。这就是当年创办晚报的三大理由。

创办晚报是我们的美好愿望,但真要办起来,却举步维艰,困难重重。新办一张晚报谈何容易?要人、要钱、要有办公室和印刷设备。当时,浙江省财政收入也不宽裕,如果要求省财政厅拨给晚报开办费,要求省人事厅拨给晚报编制,那是不可能批准的。怎么办?只有两种选择:一是遇难而退,多一事不如少一事,不找麻烦,不办晚报;一是知难而上,咬紧牙关,自讨苦吃,自力更生办晚报。我们经过多次讨论,认真分析了报社当时的人员、资金、办公用房、印刷设备的实际状况,算了几笔大账,认为可以千方百计克服困难,充分挖掘报社内部潜力,紧一紧,挤一挤,拼一拼,搏一搏,自力更生创办一张晚报。编委会统一了思想,狠下创办晚报的决心,并向省委送上要求创办晚报的书面报告。与此同时,我又个别找了省委领导薛驹、陈法文、吴敏达等同志口头汇报浙报打算创办晚报的情况,希望他们支持。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件扩大舆论阵地的大好事。

过了几天,省委办公厅通知我列席省委书记办公会议,讨论浙江日报创办晚报的议题。会上,我汇报了创办晚报的必要性、紧迫性和可行性,强调浙报挖掘内部潜力、自力更生创办晚报,并作出“三不承诺”:不要拨款、不要编制、不要添设备。从省委领导同志发言中可以看出,他们都很高兴浙江能创办一张晚报,对浙报自

力更生办晚报的思路十分赞同。最后,一致同意和批准浙江日报创办晚报的报告。我的心里就像一块石头落了地,心情非常激动,回到报社立刻把这个喜讯向编委会传达,并迅速传遍了全报社,大家都为报社即将诞生一张晚报兴奋不已。

万事开头难。我们都没有办过晚报,只能“摸着石头过河”。省委批准浙报办晚报以后,我们紧锣密鼓,一个一个落实新办晚报遇到的问题:一是晚报名称如何决定?我们广泛征求报社老领导和各方面同志以及一些读者的意见,大家开始提出十多个晚报名称。从地方特色来看,比较集中的是取名《西湖晚报》或《钱江晚报》。大家认为西湖中外闻名,但它地处杭州市,地域范围小;而我们办晚报是面向全省广大城市居民的,钱塘江是浙江的一条大江,钱江大潮也中外闻名,因此,取名《钱江晚报》是名正言顺,符合实际的。这个报名也得到了省委书记王芳同志的批准。二是晚报的开办经费如何解决?我们决定不向银行贷款,不要企业赞助,坚持勤俭节约、因陋就简的原则,从浙报历年结余利润的资金中开支费用。三是晚报队伍如何组织?我们按照“人员精干、采编合一,老中青结合、年轻人为主”的原则,从浙江日报和经济生活报各部门抽调人员。使我十分感动的是,不论抽到哪个部门的人,部门领导从不讨价还价,一律放行;不论抽调哪个同志,他都二话不说,按时报到。这种“全社一盘棋”的全局观点和服从分配的纪律

观念,是十分可贵和值得发扬的。就这样,钱江晚报的办报队伍很快组织起来了。四是晚报人员的办公室从哪里来?报社没有多余的房子做晚报编辑部办公室,只有千方百计从浙江日报各部门挤出六、七间办公室。有的部门原来办公室比较宽敞,现在一下子挤满了办公桌和人员,感到很习惯。但他们听说是为了办晚报腾房子,就毫无怨言,高高兴兴搬出办公桌,挤到其他办公室办公。五是晚报印刷设备问题如何解决?我们去找印刷厂领导商量,许多工人听说要出晚报,纷纷表示:“为了印好晚报,我们加班加点也干!”……就这样,在浙江日报当年全社员工的共同努力下,克服了各种困难,《钱江晚报》终于在1987年元旦诞生了。创刊初期发行6万4千份,以后月月不断上升,报纸不断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。十年后,《钱江晚报》发行量达到60万份,广告收入超亿元,大大超过了浙江日报的发行量和广告收入,真正成为浙江日报的支柱产业。后来,钱江晚报又闯进世界报纸500强的行列,名扬中外。

浙江日报三十年前播下的一粒晚报种子,现在已根深叶茂,结出了丰硕的果实。听说至今已有一五百多位新闻人先后奋战在《钱江晚报》的各个岗位上,为这张晚报的成功倾尽心血、无私奉献。今天,我这个曾在浙江日报工作三十年的老同志,再三向《钱江晚报》的五百多新闻战士深表敬意和谢意!因为没有他们,就没有《钱江晚报》的今天。

煮茶

耿艳菊

去后街买菜,暮色朦胧,寒风拂面,却递来一缕缕淡淡的茶香,让凛冽的寒冷减轻了几分。是临街的那户人家,屋里已亮起了灯,门口有个炉子,炉子上有个陶罐,煮着茶,咕嘟嘟唱着歌。这户人家有古意。每到冬天都会在门口生起炉火,炉子上总放着个陶罐,炖肉、熬粥、煮茶,一街的香。

由炉火想到,从前没有空调,没有暖气,古人是怎么度过漫漫寒冬呢?就是这古意悠悠的炉火呀。从前光阴慢,人们在炉火上煲汤做饭,煮茶温酒。尤其是煮茶,翻开一本本古人的诗词,到处萦绕着醉人的茶香。

唐代李中的《冬日书怀寄侄真大师》,细细描摹出一幅暖暖的图景。他写道,“落壁灯花碎,飘窗雪片粗。煮茶烧栗兴,早晚复围炉。”

严寒的天气里,从早到晚就安安静静地坐在屋子里,围着炉火,兴致盎然地煮煮茶,再烤上一些香甜的栗子。简简单单的生活,氤氲着芬芳和甘甜。

“落日疏林数点鸦,青山阙处是吾家。归来何事添幽致,小灶灯前自煮茶。”这是宋代陆游的《自法云归》。傍晚时分,走在那条悬铃木林荫道上,往家赶,西边的落日隐隐约约还能看到,一弯淡月已经挂在了树梢,我就常想起这首诗。

我们向往诗和远方,却更热爱家中这壶热腾腾的茶香。即便城市生活,早已没有了炉火的存在,但哪怕只是用玻璃杯,倒上一撮茶叶,泡一杯最清最简单的热茶,坐下来,喝一会茶,看几页书。这片刻的宁静和轻松,仿佛让粗糙的生活有了一层光芒和诗意。

读到明代董纪的《雪煮茶》,其中一首这样写道:“梅雪轩中雪煮茶,一时清致更无加。销金帐底羊羔酒,莫向陶家说党家。”煮茶这件小事里,藏着一个人的可爱有趣。

陆游也有一首雪水煮茶的诗《雪后煎茶》,更有趣了。“雪液清甘涨井泉,自携茶灶就烹煎。一毫无复关心事,不枉人间住百年。”把茶灶都搬过去了。

人们常说茶越喝越淡,这淡是味道上的淡,更是人生之态的淡然。

晒秋

马雪芳

我小时候,一到深秋放学回家,刚走到自家砖墙的西南角上,一阵阵好闻的香味直往鼻子里钻,香味里有像晒干的新稻柴的味道,有像晒干的狗尾巴草的味道,有像红枣的味道,有像新买来的书的油墨的味道……我当然知道,这些味道全来自于奶奶在砖场上“晒秋”散发出的味道。

深秋了,奶奶上午主要的活儿照例是去自家的两块菜地上采摘蔬菜,然后做菜、做饭——爷爷、父亲、母亲、姐姐、哥哥在队上劳动,差不多十一点半他们回家吃午饭,下午奶奶的主要任务则是去菜地上挖芋艿、盆山芋、摘南瓜、摘冬瓜、摘赤豆、收割毛豆等。

自中秋节一家子吃了一顿糯烧芋艿、糖烧山芋后,菜地上的芋艿、山芋就如宝贝似地不去动它们了。约一个月后,芋艿、山芋的个子都长足了,奶奶就用锄头去挖芋艿,用铁锹去盆山芋。奶奶先用“月亮”镰刀割去芋艿的秆子,再用锄头小心翼翼地一下一下在芋艿根部刨去淤泥,然后用手一捏出一粒粒鸡蛋大小的芋艿——奶奶不用锄头一下刨出芋艿,是怕锄头的口子损伤了芋艿。奶奶把芋艿一篮子一篮子拎到砖场上,用手“簌簌”地推开芋艿成薄片,在太阳地里晒。奶奶洗了手,用毛巾擦一擦额角上的汗珠,喝碗柳叶茶,就马不停蹄去菜地上拉去一行行堆土上的半枯萎的山芋藤。奶奶的铁锹是横着扒去山芋行上的泥,她不用铁锹往山芋行上垒,也是怕铁锹损伤了里边的山芋。奶奶的铁锹扒开山芋行上的泥,就露出一窝有的鲜红、有的紫红的山芋。奶奶也是一篮子一篮子把山芋拎到砖场上,用手把山芋匀平了在温暖的太阳地里晒。

奶奶用大剪刀把冬瓜藤上的冬瓜全部剪下了,挑全是白霜的五六个大冬瓜端到场地上,冬瓜在菜地上怎么样卧地的,在场地上也要摆成什么样子,几个小冬瓜奶奶随便放在厢房里,因为就要吃掉的。

奶奶用大剪刀把南瓜藤上的南瓜全部剪下了,摆放在砖场上的要求也是和冬瓜一个样。

如果天气好,到傍晚奶奶用油布把砖场上所有晒着的东西盖起来。第二天,太阳出来了,奶奶揭去油布,砖场上的这些几乎满场子的收获继续在太阳里晒。约晒四五天后,奶奶把七八十斤芋艿放在厢房里的一只木桶里,木桶上不盖盖子,奶奶把近两百斤山芋堆在厢房的一角。奶奶在她房间的床底下铺上一层干净的断砖,把冬瓜、南瓜一推上。

俗话说“霜降一齐倒”。“霜降”一到,真正的抢收水稻、抢种三麦的战役打响,生产队的社员几乎是白天在田野里割稻、收稻、播种三麦,晚上分上半夜、下半夜两班脱粒——那阳叫歇人不歇机(脱粒机),劳动强度是一年中最大了。奶奶虽不直接参加生产队劳动,但在这个“抢收抢种”期间,她在家里也十分辛苦。

鸡叫头遍,奶奶就起来做一大家子吃的早饭。除了在灶头上煮一大锅子粥,奶奶还要在行灶上煮带皮的咸芋艿或者带皮的山芋。家人吃好了早饭,就去队里劳动。别人劳动到九十点钟,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,我们家人不要紧,他们裤袋里装着芋艿或山芋,到吃午饭了体力仍是旺旺的。

奶奶还每周做一次糯米粉南瓜饼,煎得两面金黄,这在当时是一种高级的糕点了。我吃了奶奶做的南瓜饼,奶奶还用油纸包两个装在我的书包里,惹得同学们羡慕不已。

寒冬腊月,北风呼啸,菜地上除了一点大青菜,其他菜几乎没有了,不要紧,奶奶床底下有储备的大冬瓜呢。奶奶做的红烧冬瓜,上面撒上些大蒜花,鲜美清香,很下饭呢。

去年,我们在老家的宅基地上翻建新房了。新房正好建在以前奶奶“晒秋”的砖场位置。双休日,我和妻子住往从城里回乡下住,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五十多年前深秋时奶奶“晒秋”的情景,真是感慨万千。

岁月悠然

小小离家 老大回

方 萍

年届期颐的新四军老战士娄井海在两个儿子与两个儿媳的陪护下,从四川成都坐高铁,经过十二三个小时的行程到达杭州;侄儿又安排车辆接他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长塘。

娄老1927年出生于现今的绍兴市上虞区长塘镇,曾在上海读小学、当童工。1945年,辗转来到苏北参加新四军,因为童工学的是印刷,就进了一师政治部下属的《苏中报》印刷所当技工,那年18岁。解放后,娄老参加了西南服务团。1952年,《四川日报》创刊,娄老就一直在四川日报社工作,历任印刷厂厂长、省报协秘书长等职。

在有生之年再回一趟故乡,是娄老的夙愿。娄老略带伤感地说:这是最后一次回老家了,我争取再活两年,活到100岁。

我们是坐在娄老大侄子家的后院露天闲聊的。一边是一众人围着娄老谈天说地,一边是娄老的晚辈们七手八脚地忙乎着午饭。那“备战午餐”的热气腾腾的场面,像极了谁家讨媳妇办喜酒。

娄老感慨地说:昨天到家后,村里我到处转了转,老屋基本见不到了,村庄里的路都改成水泥路了,还四通八达的,都不认识了,我们家也变得我不认识了,让我记得这里是我家的就是这口井——我们叫“歪台门井”,多少年了,就它不变,井里是汨汨不绝的泉水,还有荷花,还有小鱼……娄老感慨道:农村变化太大了,一个字,就是“新”,新农村、新气象、新面貌,这是社会的发展、时代的进步。

娄老继续说:要是这口井也没了,我可记不得我家了。我的名字叫“井海”,我就是从这口“井”跳出来的“海”(上海)的哦!“井”可就是我的家乡,”娄老风趣地说,“要不然为啥叫‘背井离乡’呢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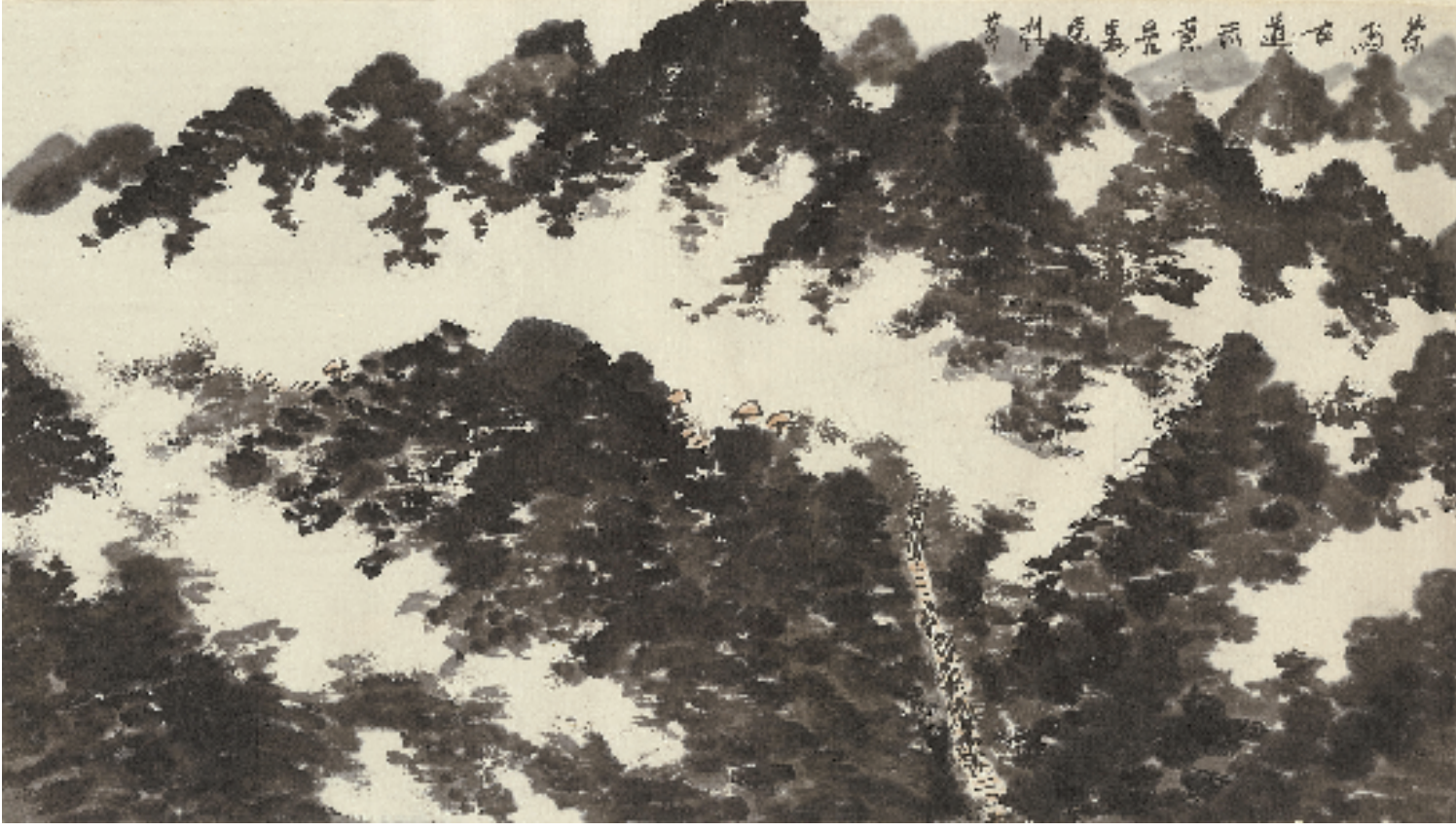
到了开饭时间,满满一桌子菜,娄老说他都要尝一尝、吃一口。白斩鸡肉、白鲞扣鸡、霉干张蒸干刀肉、干菜烩肉、清蒸芋艿、油条丝瓜……我暗思,长塘“十碗头”“廿碗头”,这些菜肴肯定都有吧?

未及细想,一盘干菜煮鞭笋转过来了,娄老糠了一筷吃了然后又去夹,还说真鲜、真好吃。又转过来一盘蛋,我说,娄老,这是“活蛋”,很好吃的。娄老看看,摇了摇头,说“我不吃”。侄子见状说,大多,这蛋是孵过的。娄老说,哦,喜蛋、喜蛋!便马上利索地拿上一个,又利索地敲开蛋壳利索地吃了起来,还说这喜蛋随便没得吃的噢!我接口说,是的,没得吃,大人也不让吃,说是“孵胎蛋”,吃了读书不聪明。娄老说,喜蛋有营养,也好吃,一壳水特别鲜。我于是顺便晓得,同一种蛋有不同表述的,我们说的“活蛋”,娄老记忆或语言习惯中是“喜蛋”。

吃着吃着,一盘剁椒鱼头又转过来了,侄子给大多夹了一大块,说这是康家湖里的鱼。娄老“哦,哦”地应着,然后小心翼翼地剁辣椒片一片一片地拣出。见状我很诧异,说:娄老您不吃辣椒?娄老说:我不习惯吃辣椒的,家乡的味道入骨了。啊,这怎么可能,几十年了呢?

体壮日健,心怡日康。娄老回乡,整个过程两个儿子、两个儿媳都形影不离陪伴,就连用餐时儿子儿媳都分秒地照顾着老爹,怕他少吃了,更怕他多吃了。娄老亦年近古稀的大儿子告诉我,他跟老爹说了:“回故乡去了您可要控制情绪,不要太激动噢!”老爹“听话”地连声应诺:“晓得,晓得!”

艺境



“浙江画院四十回望文献成果进京展”作品

《茶马古道》姜宝林

心香一瓣

邂逅“小松鼠”

赵 畅

松鼠的出现,给了我意想不到的意趣。

春晖中学地处乡野,与湖山为伴,出现小松鼠也在情理之中。上海美专毕业、为刘海粟大师学生的外祖父,当年就在春晖中学旁帮助胡愈之先生编辑《上虞声》。他告诉我,在那段短暂的时光里,见到最多的野生动物,也就是小松鼠了,“小松鼠给人的印象总是活泼、机敏与乖巧。听闻附近村民有捕杀野猪的,却从未听到有人捉拿小松鼠的。”

每当说起小松鼠,外祖父总是抑制不住心头之爱。“有一次,我偶然路过夏丐尊先生的‘平屋’,透过半掩着的黑漆木门,发现一只小松鼠正在搜索着什么,见我突然出现在门口,它便夹着尾巴匆匆溜走了。或许是小松鼠碰撞到了什么而发出声响,夏丐尊先生赶紧从屋子里出来查看”,“夏先生,没事,刚才是一只小松鼠在你家玩耍,看到我就……”外祖父赶紧解释。“哦哦,小松鼠是我家常客,或许在它眼里你才是陌生人,所以……哈哈哈。”夏丐尊先生一番颇为幽默的话语,逗笑了停留在“平屋”门口的外祖父。

当年,夏丐尊夫妇很是好客,常常邀请隔壁的朱自清、丰子恺和学校其他老师到家里吃饭,那些掉落的花生、南瓜籽、葵花籽等家常坚果,或许就是小松鼠最好的食物。

至于我,没有想到的是,与小松鼠阔别近40年,又在自己居住的小区里陆续发现了它们。有一次,一棵大树树上的一个洞穴内也出现了小松鼠的身影。树洞无疑是小松鼠最佳的栖居之所——既能遮风挡雨,又可防止天敌的侵扰。

然而,前年初冬一天傍晚突发的状况,颠覆了我原来的想象和判断。一只大鸟闯进了